

目 录

进军贵州和接管贵阳记事·····	秦天真 (1)
团结友爱战斗的班子	
——记贵阳解放初期的市委·····	张鸿志 (14)
回忆贵筑县工作的片断·····	王 枫 (20)
初建白云区人民政府纪事·····	黄佳昌 (28)
回忆二野军大女生连队的战斗生活·····	章 玲潘健君 (35)
* * *	
关于行知读书会及解放快报的回忆·····	戴自俺 (47)
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简介·····	洪 波 (68)
贵州广播电台的护台工作·····	邓 伊 (87)
贵阳电厂护厂时是怎样争取外援的·····	奚长年 (93)
贵州省盐务局解放经过·····	周荣祥 (101)
* * *	
参加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	
的回忆片断·····	李儒云 (105)
解放前后的贵阳商会·····	冯程南 (113)
肖文灿教授在贵阳师范学院·····	万湘渔 (124)
解放初期的游民乞丐收容改造工作·····	谢凡生 (130)

	*	*	*
怀念黄大陆烈士	范鼎三	(140)	
黄大陆烈士在家的情况	杨凤翥	(152)	
宋至平烈士自川入黔后的革命活动片断	曹志文	(155)	
肖元乾烈士二三事	张桂江	(162)	
卢焘先生之死侧记	刘剑寒	(167)	
怀念我的姑母刘梦华	刘君卫	(171)	
	*	*	*
记白崇禧最后一次来贵阳布防	余文炯	(177)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所秘密监狱			
——屋顶花园	黄 炜	(179)	
解放前夕贵阳市一次应变会议的见闻	彭国桢	(187)	
国民党贵阳警备司令部侦防组			
的成立及演变	邱秀虎	(189)	
解放前夕在贵阳宪兵特高组的见闻	于绛衡	(202)	
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的一次应变会	李家才	(208)	
贵阳解放前夕的见闻	傅应欽	(210)	
解放前夕的省会警察局	汪松龄	贺僑异	(214)
封二 黄大陆烈士遗像	范鼎三	供稿	
封三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出版的《解放快报》	侯明德	摄影	

3.15.1 30

进军贵州和接管贵阳记事

秦天真

贵阳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解放，到现在已三十三年。每忆及在那艰苦的年月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贵州地下党、游击队，以及勤劳勇敢的贵州各族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奋斗不止、日夜操劳、忘我工作的情景，都历历在目，激动人心。现在撰写出来，以飨读者，对于鞭策和鼓舞我们在为实现“四化”的征途中继续奋勇前进，是有意义的。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假抗日真反共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妄图攫取全国人民为之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果实，拒绝我党提出的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正确主张，破坏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下，悍然出兵向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从此，解放战争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节节胜利。一九四八年十月，北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淮海战役胜利，敌军主力被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总崩溃。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军沿长江五百余公里横渡长江，彻底摧毁

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这时，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南窜，与原驻四川的宋希濂部勾结封建势力和地方顽匪，力图利用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地的复杂地形，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

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向西南进军的号令，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一九四九年九月，二野五兵团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邓首长的命令，开始向大西南进军。

一九四九年十月，杨勇、苏振华同志所率的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按照命令，分别从湘西的桃源、邵阳地区出发，到达湖南芷江后，即分为南、北、中三路挺进。解放贵州后，十七军又协助解放云南；十六军配合十军参加了解放成都战役；十八军经贵阳至毕节，解放四川南部后，担负了艰苦的进藏歼敌任务。

向西南进军这一战斗的全面展开，形成大军压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固守顽抗，于贵定一仗，被我击溃。国民党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和八十九军军长张涛等目睹大势已去，先后率部宣布起义。在黔境内的其他国民党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沿途破坏道路、桥梁，狼狈逃窜。当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时，我军已是兵不血刃，顺利占领。

在进军途中，我军沿途张贴、宣传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安定人心，稳定了社会秩序。广大工农群众，把解放军视为当年的红军，给部队以密切的配合和有力的支援，送饭倒

水、护送病员、协助运输、修桥铺路、带路送信，军民水乳相融，亲如一家。社会各界人士多愿意遵守“约法八章”，采取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为我神速进军造成有利的形势。在这段期间内，贵州地下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地下武装，同解放军部队相呼应，紧密配合。一九四九年三月地下党员王舍人等发动的郎岱暴动，打击敌人，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继起的有黔东北游击纵队，黔北游击队，安顺、紫云、长顺游击纵队，安顺、关岭等地的游击组织，盘北游击大队，盘县游击团，兴义游击团，安龙游击团，威宁游击团等，都主动地配合解放军部队，打击和牵制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政权，促使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在黔东南地区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长期埋伏的李光庭、李长青、王毅等同志，掌握武装，配合解放，在各条战线上，不断打击敌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我军解放炉山、凯里等地得以顺利实现。

国民党反动派已到了不堪一击，纷纷溃逃的地步。但是，敌人愈临近灭亡就愈加疯狂。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贵州省保安司令韩文焕、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等人策划，成立所谓“疏散指挥部”，阴谋在逃离之前，实行“三光”政策，秘密筹划先炸毁南门大桥，烧毁报务局、话务局、贵阳电厂，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之后便组织反共骨干分子上山打“游击”，继续与人民为敌，妄图卷土重来。炸毁和焚烧电厂是他们阴谋计划的第一步，企图毁了电厂，乘全城黑暗、混乱之机，毁灭整个贵阳。为了保护城市，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保卫人民财产的斗争。地下党员陈廷维、张震生等同志，对贵阳电厂经理奚长年，晓以大

义，共同组织和领导工人、技术人员护厂供电。他们把原来秘密保存的八十支破旧步枪，经过抢修发给工人，并安装架设高压电网，站岗巡逻，实行武装护厂。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贵阳宪兵队驶来一辆卡车，寻机破坏，因群情激愤，见势不妙，只好狼狈而逃。但是，敌人并未罢休，进而狗急跳墙，反动头子刘伯龙亲自出马，指挥破坏电厂，因见护厂工人声势浩大，全市声援，又鉴于我大军兵临城下，形势紧急，慌忙逃走，罪恶阴谋未能得逞。这样，电厂终于保护下来，保证了正常发电，供应全市，成为解放前夕全国六家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受到党中央的嘉奖，中央燃料工业部还颁发了“护厂先锋”的奖旗。

在国民党反动派逃窜，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入贵阳的“真空”期间，流窜匪特到处破坏。为了解此危难，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卢焘、张彭年、郭润生等先生，响应解放军的号召，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治安，保护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解放后将他们保护的物资、枪支、弹药、车辆等全部移交军管会，为迎接贵阳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尤其值得人们深切缅怀的是，解放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乐恭彦、王启霖、刘家祥、宋致平、岳景宗、郭谨诚、张凤鸣、刘载铭、廖崇美、高言善、顾希钧、杜蓉、史健、陈开秀、杨光文、肖元乾、陆永忠、张春涛、戴绍民、金芳云、毛克诚、柏辉文、陈默、彭祖年、金春琪、刘端模、聂汝达、肖元良、蒋北忠等二十多位同志（注：此名单仅系个人回忆，可能有遗

漏），在贵阳先后惨遭敌人屠杀。其中包括当时震惊全省的“双十一”惨案。十一月十四日上午，“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知名进步人士卢焘先生，亦被刘伯龙派人骗出，挟持到二桥转弯塘杀害。

贵阳的解放，人民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人民的贵阳终于又回到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她的新生。

二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和人民灾难深重的祸根。贵阳地处黔中，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由于处于封建割据，统治者腐败透顶，残酷压榨，置广大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堪，早盼望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军进入贵阳。十一月十七日后，接管队伍才赶到进行接管。我被任命为中共贵阳市委书记、贵阳市长。我和汪乃贵（贵阳警备区司令员）、杜恩训、夏页文等同志组成中共贵阳市委委员会。由军队转业的一百一十余人，作市政府和各区委、区政府的骨干，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接管贵阳市的工作。

我回到阔别十年的贵阳，看到被反动统治者残酷盘剥、历尽艰辛的广大劳苦群众，饱含感激的热泪迎接亲人解放军，而反动派留下来的贵阳城却呈现一片破烂不堪、市场萧条、毫无生机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

当时，仅有二十三万人口的贵阳市，工业生产极其落后，全市有官僚资本经营的工厂十二家，加上私营工厂和部

分手工业约一百六十余家，其产值只占工商业总值的百分之五左右。贵阳矿山机器厂，解放前是由蒋军的修械所改成的小型军工厂，生产迫击炮，算是象样的一家工厂。此外，由伍效高经营的贵阳新生五金厂（现贵阳红星拖拉机厂的前身），破旧皮带机床不到五十台。裕丰纱厂也只五千纱锭。还有华问渠经营的黔元纸厂（贵阳纸厂的前身），生产的品种很少，产量也不多。文通书局，是个比较象样的书局，也是华问渠经营的。而大大小小的卷烟厂较多，如贵州烟草公司是国民党贵州企业公司经营的，其它有戴子儒、帅灿章经营的南明烟厂，张嘉德经营的一中烟厂，还有黄英民等联合经营的烟厂，大小二十七家，大都是合资经营，工人甚少，技术落后，均为半机器半手工操作，除了烟叶本省可以提供外，其它原材料均需省外运入。在汽车运输方面，除政府接收了五百余辆汽车外，私人经营的约有一千余辆，其中独资经营较大的为毛铁桥，联营较大的有李葆善等，因此修车行业较多。市内没有公共汽车，交通运输多靠马车、人力车、板车和肩挑背扛。此外，杨维新、帅灿章等经营的猪鬃业，在贵阳也算是较大的。

贵阳属于消费性质的城市，铺商共有五千余家，主要经营花纱布、绸缎、百货、盐巴、银行、银楼等业。许多客商经营大烟生意，将烟土运往省外销售后买回花纱布匹经营，有的兼作银元生意。在土匪叛乱期间，米商趁机大搞囤积居奇，抬高市价，有时一天之内价格几次上涨。盐巴一时供不应求，弄得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饮食服务行业比较发达，大江苏、小上海、冠生园等算是当时有名的几家。还有理发店、洗澡塘等都不少。旅馆业有国民党社会部办的“贵阳社

会服务处”和若干小旅馆。包佐基经营的药房，梅岭先的颜料，孙绥之的“味菀园”，在贵阳市来说是比较大的。银行业主要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个银行在贵阳的分行和贵州省银行（经理刘熙乙）、贵阳市银行（经理赖永初）及一些地方银行、私人银行。房地产刘熙乙、万静波等拥有较多。

贵阳市城镇建设极不象样。整个城市建设既无规划，又无计划，看上去十分陈旧破烂。当时的自来水厂，是为南明区小西湖附近的官僚、豪绅服务的，而且地下管道极不规则，水管粗细不一，为我们后来自来水供水系统的规划、铺设带来很大的困难。街道狭窄，坑坑洼洼，绝大部分是土路和少量的石板路，下雨天道路泥泞，晴天时则尘埃飞扬，最烂的街道要算市西路、三民西路（即现在的延安中路）。市西河、贯城河年久不修，河道淤塞，污水四溢，臭不可闻。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的烂摊子。

由于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关闭，工人失业、学生失学，游荡在社会上的人日渐增多。妓院、大烟馆还较为普遍，吸大烟者甚多，乞丐遍街皆是。川流大街小巷的人们，属上层的着长袍短褂，衣冠楚楚；而下层的则衣衫褴褛，流浪乞讨，景象惨不忍睹。

国民党反动派在败退时，有预谋地大量派遣隐蔽特务、反革命骨干，加上溃散的散兵游勇、豪绅恶霸、地方顽匪以及各种反动或封建的会道门组织原封未动，潜伏贵阳，因此，敌情和社情是相当严重而又复杂的。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全市有国民党职业特务约九百余人，行动队四百余人，国民党将级军官、地方专员级以上有一百人左右，散兵游勇

八千人以上，散匪一千余人，惯盗八百余人。解放后，敌人进行各种捣乱和破坏活动，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新生的革命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

三

接管贵阳市的工作是艰巨而复杂的。参加接管的一百一十多名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只有七、八人。虽然人员这么少，可是没有一个人怕苦叫困难的，都以战斗的姿态接受了任务。同志们背着行李进入接管机关。当时不仅房子破旧，而且又很少，只好既做办公室又做宿舍。记得我的行李就放在一间电话室里，晚上铺在地板上睡觉，白天卷好行李就是我的办公室。条件不好，心情却是愉快的。

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工作，十一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原市属机关全体旧职员大会，宣布接管命令，讲明“约法八章”、军代表职责及接管中的要求等。十一月二十五日，指派了二十四名军代表，划分为秘书、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公安、法院等系统，自上而下进行接管工作。到十二月十日，只用了半个月时间，接管工作基本结束。与此同时，将原来市属九个区公所划为七个区（包括三个郊区），相继建立了区委会和区人民政府。

接管工作结束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千头万绪，真是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市委认真组织干部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认识到，恢复发展生产，解决工人失业，安排社会就业，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否则，党的全心全意依

靠工人阶级的指示就不能贯彻，新生的政权就不能巩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市工商业共五千一百六十余家，其中由于无原料或无销路被迫倒闭的有三百家以上。因此，失业的工人约一万人，包括其家属有二万人以上，社会闲散居民还有五万余人，生活贫困。国家虽然多方面救济，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在全市提出“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的口号，广泛动员挖土方，修街道，挖高处填低处，使道路平坦，符合筑路标准；同时挖贯城河，使其畅通，清浊分流。每方土八角钱，开始每人只能挖半方，后来不断熟练，每人一天可以挖到一方以上。这样，解决了大批人的生活出路问题。接着在龙洞堡因陋就简，搭起土房，很快办起了一个农场，又能养活一大批人。这个农场到现在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

为了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我们除了大力发展国营工商业外，还积极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或恢复生产。而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陈职民、毛铁桥、李葆善等采取同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听从政府的安排。贵阳水泥厂生产的水泥没有销路，濒于倒闭，眼看工人就要失业。政府决定把水泥包下来，用于修建贵阳街道，计划先修六广门至大南门整条中华路，然后每年修一条街。但由于财政困难，政府无力拨款，修中华路需用四十万元，政府只拨十万元，其余三十万元均由工商界筹集支持。这既解决了水泥厂的生产问题，又很快修好一条主要干道。同时大力发展卷烟生产，帮助关闭的烟厂开工，吸收了大量副工。

要解决工人失业，安排社会就业，工作是多方面的，又是很细致的。当时贵阳市交通，还没有公共汽车，交通工具

只是马车、黄包车。我们的许多同志特别是部队战士，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看到坐黄包车的人就令其下车，造成无人敢坐黄包车的状况。这样拉黄包车的工人就有意见了，便找到市府机关来要求工作。市政府负责同志同贵阳市警备区司令员，对警备区司令部的战士们作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才使问题得到解决。此外，对吸毒者、妓女、流浪乞丐等，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安置处理，使其各得其所，逐步自食其力。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我们接管贵阳后，敌人的破坏一天也未停止过。贵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前夕，为了实现他们所谓“反共应变计划”，开办“反共游击训练班”，训练各种反革命骨干分子。这些经过训练的游击骨干和潜伏特务，勾结封建地主、豪绅恶霸，并煽动起义不久未得到改造的部分军队，趁我五兵团主力调离贵州支援川、滇两省解放，贵州武装力量薄弱之机，狂妄叫嚣“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等，大肆进行“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等反动宣传。在全省到处袭击我基层政权和工作队，伏击我军小部队，抢劫车辆，暗杀我工作人员，阻塞交通要道。匪特部队围攻贵阳周围如平坝、清镇、惠水等几个县城，严重威胁到花溪、贵州大学的安全，贵筑分区多次告急。敌人扬言要拿下贵阳，赶走解放军，夺取全省。我们的干部晚上外出或开会回家，不得不派武装护送。

由于匪特猖獗，切断了贵阳同各县的交通，造成粮食调运困难，加之粮商囤积居奇，市内供应紧张。为此，市里成立了粮食调运三人指挥小组，实行武装押运粮食。虽然想尽

各种办法，粮食问题仍很严重。经计算，我们掌握的粮食只够供应全市三天。调往贵阳的粮食，估计不日即可运到，但必须安定人心，如一抢购，一家人多买十斤就会引起更大的人心慌乱。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规定干部一律不准上街买粮，由粮食部门按需要保证供应。为了避免群众恐慌，敌人乘机破坏，决定用汽车把仓库的粮食运到各个粮店，由工会、妇联、青年团组织干部协助卖粮。人们看到粮食很多，顿时人心安定，社会秩序井然，挫败了敌人企图利用粮食紧张，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的罪恶阴谋。

为了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我们除了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外，还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尽力做好对敌的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川黔有名的红帮大爷邓占奎（扶风社的）、蓝克安等，表示愿同政府合作消除匪患。通过他们，争取了不少人坦白交代，悔过自新。为配合全省的剿匪斗争，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夜间，全市戒严，公安机关同贵阳市警备区配合，集中进行了一次对匪特的大搜捕，捕获重要匪特三百余名，破获了“西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国反共救国军司令部情报处”、“贵阳市策反委员会”等反革命组织，并及时枪决了怙恶不悛的首恶分子陈伯华、钱济渊等二十余名。这就是后来称为“三·二四大搜捕”。通过这场斗争，我们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街道治安委员会，充分发挥治安委员的作用，使社会秩序安定，偷、抢的案件大为减少。

我们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城后即明确提出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广

广泛深入地发动全市各族各界人民群众，为恢复生产沟通城乡关系，加强社会治安而斗争的方针。当时党的力量虽较为薄弱，但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成为我们培养干部的学校和联系群众的纽带。在贵阳市办了几期工训班，青训班，直到现在，两个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学员，都成了各个单位的骨干力量。当时市委提出大搞卫生，改变市容，工、青、妇等部门就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动员，中小學生轮流上街检查卫生，人人也以讲卫生为荣。市卫生局长秦克夫同志亲自督促检查，一个破烂的城市，经过大清扫，面貌大大改观，各个机关房屋虽陈旧，但却整整洁洁。

贵阳解放已经三十三年了，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的贵阳，一改解放前那种贫困、落后、破烂、闭塞的状况；一个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新兴的城市展现在人们眼前。我们已经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的消费城市，建设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已经把一个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城，建设为连接祖国各地、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已经把一个破烂不堪的旧贵阳进行了初步改造，市容显著改观；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逐步发展、提高。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根本性的历史变化，对于尊重事实、不抱偏见的人都是无可置疑的。

三十三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我们的事业尽管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尽管我们曾经出

现过左的错误和工作中的失误，在今后的工作中，也难免失误；但是我们一定能够纠正错误，不断前进。我们可以无愧地说，我们的事业是突飞猛进的，贵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贵阳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勤劳勇敢的人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原载《回顾贵州解放》〈一〉）

团结友爱战斗的班子

——记贵阳解放初期的市委

张 鸿 志

一九五〇年，贵阳市以秦天真同志为首组成了市委。领导成员中除书记兼市长的天真同志外，还有副市长杜恩训（后调北京），组织部长初是朱煜如同志，但很快调动了工作，接着是肖岗，副部长沙晓鲁，宣传部长夏页文，还有警备司令员汪乃贵以及工会主席刘子重和我。班子虽然小，但却是个团结、战斗、活力很强的班子。

许多事情，我还记忆犹新而念念不忘，当年的革命精神和风貌应该大大发扬。下面我选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写出来。

一、我们这些委员原来都互不相识，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东北的、有来自部队的、有来自冀鲁豫的。而我来自江苏。但不管那个山头来的，组成市委后，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竭尽全力拧成一股绳。大家树雄心，立壮志，一定要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破烂不堪的城市，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城市。同志们各按自己的分工联系，白天下到基层，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晚上开会商讨问题，常常开到三更半夜。

市委一班人各有自己的特点。秦天真同志是个民主作风

很好的书记，一边吸烟，一边思考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有时数着，他常常两包烟吸完了，会议还没结束。肖岗同志是个文文静静考虑问题非常周全的同志。夏页文同志则是个性情刚直，观察问题十分敏锐，巷子扛木头直来直去的人，他是个始终保持了军队的优良作风的精明强干的好同志。在主要负责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的影响下，个个心情舒畅地工作，从没听说那个人为什么公事、私事闹情绪，消极怠工。虽然我们各有个性，但我们都有一心干革命的共性。

二、刚刚解放的贵阳市，敌特分子的反革命活动尚未停止，反动武装还没有消灭。在市内常有谣言风传，晚间常常发生东一枪、西一枪的扰乱破坏活动。有一天夜晚，市委正在开会，市委楼外，四周枪声大作。我们立即停止了会议，人人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卫枪枝（这时各人都还有枪），冲出大门外，协助警备司令部的同志，搜剿反革命分子。搜剿完毕照旧开会。还有一次晚上，我一个人从市委开完会，刚走到筑同路，就碰上了武装反革命分子，边放枪，边叫喊。我随身走进一家卖肠旺面的小饭店里去，老板娘把我掩护起来，才免去杀身之祸。另一次，我和陈昌琴同志晚上到富水南路一位积极分子家中去（是一个矮胖胖的小学教师，可惜我已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在小巷子里又碰到敌特分子，由于昌琴路熟，转弯拐角才甩掉了敌人。我们常常处于这样的危险境地，可是没有一个人怕死，照样坚持工作，坚持深入群众。以秦天真同志为首的市委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我们到基层去活动的同志的安全，一方面叫我们提高警惕性，晚上少下去，一方面要警备司令部派武装战士保护我们。

在市委这个集体里，同志间的关系是十分真诚的，彼此